



### 北宋贡举与经学变古（杨世文）

（2007-7-13 15:24:11）

作者：杨世文 转载于：儒藏网（<http://www.ruzang.net/xueyuan>）

。王安石曾感叹道：“呜呼！学者不知古之所以教，而蔽于传注之学也久矣。当其时，欲其思之深、问之切而后复焉，则吾将孰待而言邪？”（《临川先生文集》卷71《书洪范传后》）为此，他亲自撰述《洪范传》，意在阐明长期汨没不显的“洪范大义”。以今天的眼光来看，王安石的《洪范传》与汉唐经师的章句注疏之作，无论是著述体裁，还是阐释方式、学术见解都有明显区别。《洪范传》注重从思想上推阐箕子所陈“洪范九畴”的精义，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（参见郑涵《北宋洪范学简论》，载《中州学刊》1981年2、3期；又收入林庆彰主编《中国经学史论文选集》下卷第55—81页。）。对此，以尊汉学、反宋学著称的清代名儒胡渭也不得不承认：“王氏此义，如《说卦》之广象，虽未必皆圣人之意，而亦未尝背于理；视彼拘拘而鲜通者，有鹏、鸚之别矣”（《洪范正论》卷2）。王安石《洪范传》对《尚书·洪范》的诠释，鲜明体现了北宋“义理之学”的特色以及“通经致用”的时代特点，可以视为北宋经学义理之学的一个典范。《三经新义》更是贡举改革的产物，对北宋中后期读书人有着深刻的影响。三书先后修成之后，便“颁于学官，用以取士”。由于《三经新义》的官学地位，使得它对北宋经学的实际影响远非一般私家著述所能比拟。到哲宗即位，司马光被起用，新法一一全被废罢，并明令禁止读书人学习《字说》，而对于《三经新义》则不但未予禁止，且仍然受到好评。例如最忠实于司马光的刘摯，在元祐元年（1086）论劾国子司业黄隐排斥《三经新义》的奏疏中说道：“故相王安石经训经旨，视诸家义说，得圣人之意为多，故先帝以其书立之于学，以启速多士，与先儒之说并行而兼存，未尝禁也。隐猥见安石政事多已更改，辄尔妄意迎合傅会，因欲废安石之学，每见生员试卷引用，辄排斥其说，此学者所以疑惑而怨之深也。夫安石相业虽有间，然至于经术学谊，有天下公论在，岂隐之所能知也！朝廷既立其书，又禁学者之习，此何理哉？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三九〇，元祐元年七月末）邓广铭先生认为：“在北宋一代，对于儒家学说中有关道德性命的义蕴的阐释和发挥，前乎王安石者实无人能与之相比。由于他曾一度得君当政，他的学术思想在士大夫间所产生的影响，终北宋一代也同样无人能与之相比”（《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》，载《邓广铭治史丛稿》第189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7年3月。）。确为见道之论。王应麟在评论北宋经学思潮转变时说：“自汉儒至于庆历间，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。《七经小传》出，而稍尚新奇矣！至《三经新义》行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”（《困学纪闻》卷8）。王应麟认为北宋经学风尚的转变，初始于刘敞，大成于王安石。由此可见，以推阐经典义理为最高目标的宋代经学是在北宋中期，确切地说是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开始形成，而与欧阳修、刘敞等人的倡导分不开的。以王安石《三经新义》的颁行为标志，宋代经学完成了注疏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过渡。（参见张广保《经世致用：荆公新学对经学原典精神的复归》，载《经学今论续编》第500页，辽宁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10月。）

再次，贡举改革推动了疑经改经的学术风气。庆历之际是经学史上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，学者敢于怀疑传统经说，提出新的解释，以己意重新解经的活动十分活跃。前人说经学“至庆历始一大变也”，风气标新立异，“视汉唐之学若土梗”，这充分地显示出读书人思想解放和寻求新的思想出路的发展趋势。宋代经学怀疑思潮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：第一个层次是对传世经典的怀疑，如对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等经典本文的怀疑与考辨。第二个层次是对汉唐传注的怀疑。如对《毛诗》、郑笺、《左传》杜预注、《公羊传》何休注、《谷梁传》范宁注以及孔颖达《五经正义》的怀疑与批评。第三个层次是对先儒经说的怀疑，如关于郊禘、裕享等说法。第四个层次是对传统经学研究方法的怀疑，如对汉唐章句训诂的注释方式提出的怀疑与批评。宋初经学虽然表现出守旧与创新的双重色彩（参章权才《宋明经学史》第60页，广东人民出版社，1999年9月。），但基本上“无取新奇”，贾边因不守注疏而被黜落，就是显例（见《文献通考》卷30《选举考三》）。随着贡举改革的推行，到庆历之际经学学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欧阳修开创了北宋大规模疑古的先河。他所著的《诗本义》、《易童子问》等经学著作，勇于疑经，为学者所熟知。（参见赵贞信《欧阳修对经学上的贡献》，载《文史哲》1958年第3期）由于欧阳修在当时文化思想界的

地位，他的疑古学风影响颇大。除了系统的经学著作外，欧阳修等学者还通过策问等形式，在考试中启发士人勇于怀疑。策问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。北宋一些经义策所问关于经学、经典的问题，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人对于儒经的一些困惑，要求应试者对这些疑问作出符合儒家义理的解释。如欧阳修《问进士策》关于变革，《礼记》说：“异世殊时，不相沿袭。”而《尚书》却说：“事不师古，匪说攸闻。”一个讲变革，一个讲师古，“《书》、传之言，其戾如此，而孰从乎？”（《欧阳文忠公集》卷四八）司马光虽对疑经学风颇有微词，但他的一些策问也涉及到很多经学、经典中的问题。《策问五道》之二就讲到《尚书》中关于尧用鲧治水的问题：尧既然大圣人，他应该知道“鲧之不善”，却让鲧“任事九年”，使万民遭罪。因此让人怀疑《尚书》的记载有问题。之四又讲到《夏书》、《周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春秋》这些经典之中关于“赏延于世”（世卿世禄）有不同的说法，甚至相反的观点，“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皆圣人所以仪范后世也，今其言乃违戾如是，岂圣人之道渊微奥远，学者不足以至也？”司马光只能用“圣人之道渊微奥远”来解释这些矛盾。但这些问题在经典之中存在的问题必然使学者有无所适从之感。在《策问十道》之中，司马光也提出了很多关于经典的疑问。如之四关于《鲁颂》与《春秋》中所反映的鲁僖公的形象，差异非常大，“世之为《诗》者，皆称鲁僖公能遵伯禽之法，鲁人尊之而为之《颂》。自孔子删《诗》，而存著不去，非虚美也。”但在《春秋》之中僖公的形象就截然相反：“今以《春秋》迹之，或违礼而动，或作事不时，至于修泮宫，伐淮夷，作新庙，皆无闻焉。殆若与《颂》不相应者，其故何哉？”之七又说，《曲礼》讲“礼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”，但《王制》中为何又有“庶人之礼”，《舜典》中为何又有“大夫之刑”？诸如此类的矛盾甚多，兹不多举。此外，经典所记与历史事实有出入。如关于《周礼》，誉之者以为是“周公致太平之法”，贬之者说它是“渎乱不经之书”、“六国阴谋之说”。欧阳修指出两点可疑之处：一是《周礼》设官分职脱离历史实际，二是后世按《周礼》改制，往往招致败亡（《文忠集》卷48）。这些策问虽未明言经典之伪，但怀疑意向是非常明确的。举子往往顺着推衍阐发，自然而然会得出经书不可信的结论。欧阳修而后，策问“疑经”蔚为风气，为了应试，不能不下功夫找疑点。台湾学者叶国良认为：“宋代朝廷之措施，助长疑经之风气者，盖以此为最大。吾人观宋代疑经改经者大抵为进士出身，则其中消息，明眼人能洞悉也。”（《宋人疑经改经考》第六章《结论》，台湾丛刊之五十五，1980年初版，第152页。）

由于这些知名学者的示范作用，疑古惑经形成一股潮流。司马光在宋神宗熙宁二年上《论风俗札子》，对当时科场的情况描述说：“窃见近岁公卿大夫好为高奇之论，喜诵老庄之言，流及科场，亦相习尚。新进后生，未知臧否，口传耳剽，翕然成风。至有读《易》未识卦爻，已谓《十翼》非孔子之言；读《礼》未知篇数，已谓《周官》为战国之书；读《诗》未尽十二公，已谓《三传》可束之高阁。循守注疏者谓之腐儒，穿凿臆说者谓之精义。且性者，子贡之所不及；命者，孔子之所罕言。今之举人，发言秉笔，先论性命，乃至流荡忘返，遂入老庄。纵虚无之谈，骋荒唐之辞，经此欺惑考官，猎取名第。利禄所在，众心所趋，如水赴壑，不可禁遏”（《温国文正司马公集》卷45）。司马光揭示当时科场存在的四个问题：一是喜诵老庄，二是怀疑经传，三是不守注疏，四是好言性命。南宋陆游谈到庆历以后学风转变说：“唐及国初，学者不敢议孔安国、郑康成，况圣人乎！自庆历后，诸儒发明经旨，非前人所及。然排《系辞》，毁《周礼》，疑《孟子》，讥《书》之《胤征》、《顾命》，黜《诗》之《序》，不难于议经，况传注乎！”（《困学纪闻》卷8引）可见庆历之后经学风气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，这与北宋贡举改革是密切相关的。

[\[第 1 页\]](#)

[\[第 2 页\]](#)

[\[第 3 页\]](#)

[\[第 4 页\]](#)

[\[关闭窗口\]](#)